

# 第一章 绪 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意义

### 一、选题缘起

居住在中国西南金沙江流域滇、川、藏交角区的纳西族先民，远观天象，近取诸身，依天地、日月、山川、木石、鸟兽等物象而造形，创制了东巴文。东巴文之所以备受世人瞩目，主要原因大概有四：其一，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三十多种民族文字中，自源文字仅汉字、东巴文、彝文、水书4种而已，东巴文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二，东巴文作为兼有图画和象形文字特征的文字体系，其文字形态反映了人类文字从表形图画过渡到表意、表音文字的完整过程，对研究人类文字的发生、发展无疑是弥足珍贵的材料。其三，东巴文沿用至今，成为人类唯一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系统，是研究人类文化史特别是文字史的“活化石”。其四，卷帙浩繁的东巴古籍文献，内容涉及纳西族古代社会形态、民族历史、原始信仰、宗教哲学、科学技术、天文、历法、地理、军事、文学、艺术等，是纳西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2003年，东巴古籍文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笔者出生在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三坝纳西族乡白地行政村波湾自然村。白地是纳西族东巴文化的发祥地，是东巴教圣地，在东巴教中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各地纳西族东巴一生中至少要到白地朝拜一次，并在这里学习经文和仪轨，接受白地东巴为他们举行的“加威灵”仪式的加持，所以民间有“没有到过白地，不算真正的东巴”的说法。白地保存了大量的东巴经典，产生了不少学问高深的大东巴，传统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受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较小，是目前纳西族东巴文化原始风貌保存最完好的地区之一。

在笔者少年之时，恰逢传统宗教民俗经过“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重见天日的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自小耳闻目睹东巴文化，一种深刻的文化情结融入了血脉之中。1993 年师从本村纳西族著名大东巴树银甲先生（1922—2005 年）学习东巴典籍和东巴教仪轨。当时学习东巴的目的很是单纯，看到东巴文化后继无人面临失传，颇感可惜，凭一己之力难以力挽狂澜，觉得力所能及的最好办法就是学下来，学到多少就保护了多少，从此踏上了一条与东巴文朝夕相伴的道路。1998 年从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毕业时，放弃了待遇较好的行业，而选择了与东巴文化关系密切的丽江东巴文化博物馆。在博物馆的东巴文化研究、传承等工作中，经常开展田野调查，得以经常与不同区域的东巴们交流，浏览学习不同区域的东巴文献，对纳西东巴文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导师喻遂生教授治学严谨，长于甲金、东巴文等古文字研究，成果丰厚且十分重视第一手语料和田野考察，多次徒步进入川滇交界区域考察。虽年逾花甲仍翻雪山越大江，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令人扼腕折服。承蒙先生厚爱，有幸在先生座下攻读比较文字学博士学位，在先生悉心指导下，笔者接受了严格的文字学学科训练，学会用学术的眼光分析东巴文，用科学的方法

研究东巴文，对东巴文有了更为客观、科学的认识。之所以选择《白地波湾村纳西东巴文调查研究》为题，首先是基于上述对东巴文和波湾村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以波湾村作为调查点，还因为这里是目前纳西族地区传统文化保留最好的村庄之一。

波湾村是白地古老的纳西村落，目前有 72 户 350 人，全村都是纳西族，有着悠久的东巴文化传统且传承至今。早在一千多年前波湾村就已经进入比较发达的农耕社会。<sup>①</sup> 相对稳定的农耕社会无疑是文化积淀的温床，使得历史上波湾村的东巴文化十分发达。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白地区域性的大型东巴祭祀仪式都由波湾村的东巴主持，如每年“二月八”白水台复合型大仪式、四月顶灾仪式、七月禳灾祈丰仪式等。1957 年时，全村 30 户 184 人，有东巴 15 人，东巴人数占总人口的 8% 强，远远高于民国时期纳西族地区东巴占总人口 0.8% 的比例。<sup>②</sup> 因地理环境封闭，波湾村民国后期方有零星的汉文化教育，故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深厚的文化底蕴、封闭的地理环境和民众对东巴教的虔诚信仰使波湾村至今仍较多地保留了东巴文化的原生状态和丰富内涵。

波湾村至今是东巴文使用状况的“活化石”。波湾村的东巴传承具有悠久的历史，家庭传承具有坚韧的延续性，很多东巴世家一直不断地传承至今。波湾村至今保留了祭天、祭自然神、开丧超度、退口舌等传统东巴祭祀仪式，在这些仪式上还在使用东巴文、东巴经。有和学仁、树应田、和学胜等东巴可对经文和应用文献进行释读，有杨国栋、和国栋、和学义等熟悉村寨

<sup>①</sup> 云南省中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甸县志》，7 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sup>②</sup> 和志武、郭大烈：《东巴教的派系和现状》，见郭大烈主编：《东巴文化论集》，39 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历史、风俗习惯的乡土文化精英可为研究提供丰富的田野调查材料。

波湾村保存了丰富的东巴文献。波湾村的东巴文献虽然在“四清”运动时经历了浩劫，但仍然有许多文献保存了下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著名大东巴树银甲先生依照记忆复写过不少的经书，和学仁东巴等人从其他东巴处转抄了不少经书，目前收藏东巴经最多的和学仁东巴收有近百册东巴经。东巴经除了祭祀用经典外，另有历书、仪式规程、占卜用书等。应用性文献有地契、账本、人情簿、歌本等。从语言种类来看，除了记录纳西语外，有记录藏语的藏语音读文献。从文字种类来看，有东巴文、藏文双语书写和东巴文、彝文双语书写的文献。特别是其中的东巴文、彝文双语账本和东巴文、藏文双语契约在其他纳西族地区均未发现，仅见于波湾村。2007年，我们在原丽江县<sup>①</sup>范围内做民间东巴文化存活状况调查，发现只有塔城、鲁甸、大具3个乡的极少数村庄还有少量东巴文献，其他绝大多数地方都已经没有东巴文献。所以说波湾村还保留有类型多样、品种齐全、数量较多的东巴文献，这在整个纳西族地区都已经罕见。

从东巴文字的特征看，白地东巴文简洁古拙、造型优美、字源清晰。祭祀经典中有词无字的情况较多，许多虚词和抽象词汇没有记录，而应用性文献文字完全记录语言，两者并存，可做比较研究。假借字和形声字都已产生，但形声字数量较少，尚未产生标音文字（哥巴文），比丽江等地的东巴文更接近文字的原始面貌。波湾村纳西语保留古语较多，语言文字联系度较高，是研究纳西族语言文字关系和语言文字发展的理想之地。

---

<sup>①</sup>2002年，丽江撤地建市，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分设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和古城区。

## 二、选题意义

对波湾村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对东巴文研究的重要补充。东巴文反映了人类文字从表形图画过渡到表意、表音古典文字的完整过程，作为兼有图画和象形文字特征的文字体系，作为人类唯一仍在使用的完整象形文字系统，对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人文背景和存活现状的研究，将有助于普通文字学、比较文字理论的发展。东巴文从白地到丽江等地的发展轨迹，本身也是纳西族迁徙和东巴文发展历史的反映，对白地进行定点的、专题的、深入的研究有助于深层次寻找东巴文形成和发展的内因，从源头上推进东巴文的研究。目前东巴文研究有很多问题说不清，甚至出现讹误，主要是因为对其来源缺乏认识。本研究可以在东巴文的源头建立一个参照系统，对整个东巴文研究可以起到推动发展的作用。同时，还可为汉藏语、文字学、民族古籍整理、民族古文字辞书编纂、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提供材料和借鉴。

以往东巴文研究以丽江为主，对白地等地的研究较少。即使对白地有些研究，也是以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为主，文字学的研究较为薄弱。特别是由于历史、行政区划、旅游文化宣传等方面的原因，目前对白地的许多论说都是片面的只言片语，甚至自相矛盾。本研究可以比较客观、全面地展现东巴教圣地的文字、文献状况，可填补资料和研究的一些空白。

目前纳西族地区东巴文化生存基础脆弱，生态环境恶化，东巴人数锐减，东巴水平急降，东巴仪式数量减少，活动内容不断简化，传承大多处于自生自灭、后继乏人的窘境。本研究有助于抢救东巴文化遗产，特别是文字、文献遗产，通过抢救整理留住民族文化的根；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帮助民众找到原

生态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新文化和谐发展的转型之路。波湾村东巴文化的传承还没有完全断绝，有3名青年在学习东巴经。本研究可使学术研究和民族文化的传承相结合，产生现实的社会效益，有助于东巴文化的传承。

## 第二节 东巴文百年研究述评<sup>①</sup>

1894年，拉卡珀里尔（Terrien de Lacouperie）所著《西藏周围的文字起源》一书在伦敦出版，在欧洲首先拉开了东巴文研究的序幕。<sup>②</sup>时至今日，对东巴文的研究已有上百年历史。百余年来，海内外诸多学者对东巴文的研究倾注心血，他们或深入田野调查、收集资料，或对东巴文献进行整理、翻译，或编订辞书说文解字，或从文字学的角度对东巴文的性质、创始年代、源流、结构特征等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或从比较文字学的角度与其他古文字进行比较研究，著述丰厚，已经成为我国除汉

---

<sup>①</sup> 本节主要内容已于2011年以《东巴文百年研究与反思》为题发表于《思想战线》第5期。

<sup>②</sup> Rock Joseph. A Na-khi — English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Introduction XXIX. Roma: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ed Estremo Oriente, 1963.

杨福泉、白庚胜《国际纳西东巴文化评述》（见白庚胜、杨福泉：《国际东巴文化研究集粹》，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杨福泉《西方纳西东巴文化研究评述》[《云南社会科学》1991（4）]把拉卡珀里尔的书名译为《西藏境内及周围的文字起源》，出版时间为1885年。

和匠字译《纳西语英语汉语语汇·引言》中Terrien de Lacouperie译为拉科皮瑞，书名译为《西藏书写文字的开端》，详见《纳西语英语汉语语汇》，28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

甘雪春《走向世界的纳西文化——20世纪纳西文化研究评述》（37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出版时间误作1855年。

字学以外最为热门的一个文字学研究领域。以下我们将对百余年来研究状况做一回顾。

## 一、文献资料收集和文字调查

### (一) 汉文献对东巴文的记载

《木氏宦谱》最早记载了纳西族有“本方文字”，该书由明代纳西族土司木公（1494—1553年）始撰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内有木氏先祖牟保阿琮传曰：“生七岁，不学而识文字。及长，旁通百蛮各家诸书，以为神通之说，且制本方文字。”<sup>①</sup>方国瑜先生认为：“所谓‘不学而识文字’，当是纳西象形文字，‘制本方文字’，当是标音字。”<sup>②</sup>喻遂生先生认为“不学而识文字”当是汉文，“制本方文字”指的是东巴文而不是哥巴文。<sup>③</sup>

最早对东巴文的明确记载，见于清余庆远《维西见闻纪》，其《夷人》“麽些”条说：“有字，迹专象形，人则图人，物则图物，以为书契。”<sup>④</sup>余文虽然寥寥几句，但对东巴文主要特征的描述是准确的。方国瑜《维西见闻纪·概说》称此书：“书中所纪天时、差异、旅途、险阻、人种、习尚以及土宜、产物，多近事实，

<sup>①</sup> 据《丽江志苑》1988年第二期《木氏宦谱》排印本，前有张志淳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序。同书所载方国瑜《木氏宦谱概说》曰：“可知《木氏宦谱》始作于正德年间，出木公手。自后时有增益，止于清初。”

<sup>②</sup>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44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sup>③</sup> 喻遂生：《纳西东巴文概论》，7～9页，重庆，西南大学研究生教材，2002。

<sup>④</sup> 方国瑜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62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绪论》断句为“有字迹，专象形”，3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非道听途说好为奇异者可比，言滇省西北风土，允为善本也。”<sup>①</sup>

成书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的《中甸县志》<sup>②</sup>由时任中甸县长段绶滋编纂，其书“语言文字”设有“摩些文”一目，对东巴文的来源、造字、特征、书写工具、书写格式做了描述，并列举了天、地、日、月、风、云、雷、雨、山、水、土、木、父、母、子、女16个东巴文和8个异体字，以及1个起始符号。此材料对东巴文特征的描述甚是精彩，但却因传布不广，被以往学者所忽略。

总的来说，历史文献对东巴文的记载不多，今后应该注意收集史书、方志、笔记、游记等材料中对东巴文的记录。

## （二）文献资料的收集

1894年拉卡珀里尔《西藏周围的文字起源》发表后，东巴文引起西方人的广泛注意。<sup>③</sup>1922年，英国植物学家福雷斯特（G. Forrest）出售了135本东巴经给曼彻斯特约翰·赖兰兹图书馆，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收藏东巴经最多的图书馆。1922年，洛克到丽江后逐渐集中精力从事纳西东巴文化的研究，一直到1949年离开中国，洛克经手收购的东巴经达7000多册。<sup>④</sup>1944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长孙昆亭·罗斯福（Q. Roosevelt）在纳西族地区也征集1861册东巴经书带回美国。<sup>⑤</sup>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大概有2万多册经书

① 方国瑜编，徐文德、木芹、郑志惠纂录校订：《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57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② 段绶滋纂修，和泰华、段志诚标点校注：《中甸县志》（民国），见中甸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中甸县志资料汇编》，第3册，1991。

③ 杨福泉：《西方纳西东巴文化研究述评》，载《云南社会科学》，1991（4）

④ 杰克逊：《纳西族宗教经书》，见郭大烈编：《东巴文化论》，628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⑤ 郭大烈等主编：《丽江第二届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附录之《东巴文化百年大事记》，588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



收藏于国外。

国内学者收集东巴经较早的是方国瑜。方先生 1933 年受刘半农之命回丽江学习、调查东巴文。1935 年，周汝诚随当时的中央民族考察团，在中甸白地收集东巴经千余册。<sup>①</sup>1940—1943 年，李霖灿在丽江地区为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收集东巴经 1500 册。<sup>②</sup>1942 年，万斯年从丽江为北平图书馆收集东巴经约 4000 册。<sup>③</sup>解放后丽江文化馆收集 4000 册，中央民族学院收集 1000 册，云南省图书馆 600 册，云南省博物馆 300 册。<sup>④</sup>丽江博物院约 1000 册，迪庆州博物馆约 400 册。另有一些经书收藏于私人手里。

纳西族民间收藏的东巴文献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销毁殆尽，这使珍藏于海内外各图书馆、科研机构的这批经书成为研究东巴文的无比珍贵的材料。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随着民间宗教、民俗活动在纳西族地区得到一些恢复，一些有志之士开始收集和抄写经书。2009 年，据喻遂生、杨亦花对云南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的逐村排查，该乡现藏新老东巴经在 1000 册以上，这说明东巴文的收集调查还大有可为。

### （三）东巴文调查工作

20 世纪 20 年代始，伴随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前人做了许多纳西族语言文字调查、收集工作。是时成就最高的当属杨仲鸿、洛克、方国瑜和李霖灿 4 位先贤，他们的情况将在

<sup>①</sup> 周汝诚：《永宁见闻录》，见《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sup>②</sup> 李霖灿：《与骆克博士论麽些形字音字之先后》，见《麽些研究论文集》，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4。

<sup>③</sup> 杰克逊：《纳西族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载《世界民族》，1992（6）。

<sup>④</sup> 和志武：《纳西东巴文化》，92 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下文“字典辞书编纂”等章节中做专门论述。

20世纪30年代，荷兰传教士曾创制过一套纳西文字，采用的是拉丁字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民族识别和给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语言文字调查。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先后派出民族访问团，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调查，调查材料后来由国家民委编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这套丛书有关纳西族的调查资料里有些东巴文的记载，但大多显得零散。这时期纳西语的调查、整理大多没能结合东巴文，研究者更寥寥无几。通过民族语言调查，创制了《纳西族文字方案》，为拉丁字母拼音文字，但未能有效地推广。

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民族组于1976年8月油印的和志武先生《纳西象形文和东巴经（调查资料）》<sup>①</sup>，是第一份比较系统的东巴文调查报告，分为纳西象形文的产生及其历史、东巴教和东巴经、受东巴经影响而派生的文字和经书、纳西象形文的特点、格巴文的特点、东巴经的语言六部分。和志武先生后来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大多以此为基础写成。稍晚有朱宝田《纳西族象形文字的分布与传播问题新探》<sup>②</sup>等文章发表。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丰硕调查材料相比，学界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东巴文的现状缺乏客观、详细的了解。近年，喻遂生、和力民、和继全、杨亦花、钟耀萍、曾小鹏等对俄亚、三坝、鲁甸、拉伯等乡做过比较全面深入的调查，并有成果发表。特别是由喻遂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亚、白地东巴文调查研究”即将结项，将会有更新、更多的成果问世。但这些调查都还是点而不是面，急需扩大和深入。

<sup>①</sup> 此书《东巴文化论集》496页著录为《纳西族的象形文字和东巴经调查报告》，未注明作者。

<sup>②</sup> 朱宝田：《纳西族象形文字的分布与传播问题新探》，载《云南社会科学》，1984（3）。

## 二、文献资料刊布、翻译、整理

### (一) 文献刊布和翻译

目前我们见到的国内最早刊布的东巴文经书是 1938 年陶云逵的《麽些族之羊骨卜及肥卜》<sup>①</sup>，文中以原文、汉译和注释的形式公布了 3 本东巴文卜书。1946 年，李霖灿、张琨、和才用东巴经原文、国际音标记音、汉语译文和注释四对照的形式，编成了《麽些经典译注六种》，此书 1957 年在台湾出版，1978 年，又增订为《麽些经典译注九种》<sup>②</sup>。1948 年，傅懋勳《丽江麽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sup>③</sup>出版，其形式也是四对照。1981 年、1984 年，傅先生在日本出版了《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上下册，1993 年又发表了傅先生遗作《纳西族祭风经〈请洛神〉研究》<sup>④</sup>。1962—1965 年，丽江县文化馆整理石印《崇般图》等四对照本 22 种（有的无注释）。1981 年，成立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1991 年改为所，2005 年改为院），组织科研人员，聘请东巴，开始了对东巴经全面、系统、科学的抢救整理工作。1986—1989 年该所出版《纳西东巴古籍译注》<sup>⑤</sup>3 辑，共收东巴经 10 种。至 1991 年，东巴文化研究所已记音翻译了东巴经 1300 余种，并油印了四对照本 25 种。<sup>⑥</sup>1983 年，和

① 陶云逵：《麽些族之羊骨卜及肥卜》，载《人类学集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8（1）。

② 李霖灿等：《麽些经典译注九种》，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

③ 傅懋勳：《丽江麽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武汉，武昌华中大学，1948。

④ 傅懋勳：《纳西族祭风经〈请洛神〉研究》，载《民族语文》，1993（2～6）。

⑤ 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纳西东巴古籍译注》（一）（二）（三），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1987、1989。

⑥ 参见《十年的回顾》，载《东巴文化研究简讯》（东巴文化研究所编），1991（1）。

发源、杨德鋈发表《东巴舞蹈经典译注二种》。<sup>①</sup>1990年，杨德鋈等的《纳西族古代舞蹈和舞谱》<sup>②</sup>出版，刊布东巴文舞谱4种。1999年11月，东巴文化研究所《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sup>③</sup>100卷（收东巴经897种）编成出版。20世纪80年代，德国科隆大学印度东方学研究所雅纳特与夫人合作，出版了东巴经摹写本8大卷。<sup>④</sup>2003年，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参编了《西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12~14卷《纳西族文字文献》。<sup>⑤</sup>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申请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哈佛燕京学社藏纳西东巴经译注”成功，该所遂与燕京学社、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合作，开始翻译这批经书。第一卷已于2011年1月出版，翻译东巴经19册。<sup>⑥</sup>

东巴文献的翻译从面上说，集大成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缺收白地、俄亚等地的经书，就是丽江本地的经书也有漏收的，离“全集”还有距离，尚需补充。经书之外，民间还有不少地契、账簿、书信等东巴文应用性文献，喻遂生翻译刊布了十多样，数量还是很少，有待于进一步努力。

从方法来说，鉴于东巴文在书写经书时，大多没有逐词记录语言，且文字不成线性排列，文字只起提示诵经的作用，只看文字，并不能读懂经典，以往资料的注音、解读、注释、翻译

① 和发源、杨德鋈：《东巴舞蹈经典译注二种》，载《民族学报》，1983（1）。

② 杨德鋈等：《纳西族古代舞蹈和舞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③ 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④ 参见杨福泉：《西方纳西东巴文化研究述评》，载《云南社会科学》，1991（4）。

⑤ 《西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12~14卷《纳西族文字文献》，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哈佛燕京学社编：《哈佛燕京学社藏纳西东巴经书》，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等有的做得不细不精。喻遂生认为必须将文字进行切分，逐字进行解释，即所谓“字释”。“字释”解释每个字的音义，有的还有字形、字义的分析。如果是假借字，还要解释其假借义和读音。如果有一字读多次、有字无词、借形字等情况，还要作出适当解释。只有这样，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如字数的统计、结构的分析等等。以往的研究，对此多有忽略，导致结论的不实。我们认为在刊布东巴经时，还是以四对照形式为好，对重要文献最好能做字释。喻遂生对十多件东巴文应用性文献做了字释。西南大学文献所钟耀萍、曾小鹏、孔明玉、张毅、刘纳雪、杨亦花<sup>①</sup>等同学撰写的硕博论文对一些东巴经典做了字释。

## （二）文献编目

近年来开展的另一项东巴古籍文献的整理工作是经书编目。1987年开始，北京图书馆（后改名为国家图书馆）对馆藏的近4000册东巴经的原有目录进行补充著录，油印了《北京图书馆馆藏东巴经目录》共6册，著录有馆藏编号、象形文书名、国际音标标音、汉文译名、内容提要、开本、张数等。1998年始，云南省博物馆的朱宝田先生分别对美国国会图书馆藏3000多册东巴经书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598册东巴经书做了编目，并

<sup>①</sup> 钟耀萍：《纳西族汝卡东巴文研究》，西南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曾小鹏：《俄亚拖地村纳西语言文字研究》，西南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孔明玉：《纳西东巴经〈给死者换寿岁〉字释及研究》，西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张毅：《纳西东巴经〈黑白战争〉字释及研究》，西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刘纳雪：《纳西东巴经〈大祭风·超度男女殉情者·制作木身〉字释及研究》，西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陈霞：《纳西东巴经〈思恒尼汝、高勒高趣的故事〉字释及研究》，西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莫俊：《纳西东巴经〈九个天神和七个地神的故事〉字释及研究》，西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张杨：《纳西东巴舞谱〈舞蹈的出处和来历〉研究》，西南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杨亦花：《白地和志本东巴家祭祖仪式和祭祖经典研究》，西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陈靖：《东巴文〈民歌范本〉研究》，西南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何宝芝：《〈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婚俗经典研究》，西南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在美正式出版，只是朱所做编目讹误太多，使用时应特别注意。2003年，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组织学者编写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收入《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897册东巴经和一些东巴文文书、东巴文铭刻，以及部分白地经书做了著录，对国家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南京博物馆（部分）、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图书馆、东巴文化研究所、丽江县图书馆等机构的东巴经进行了国际音标书名、汉译书名方式的存目。纳西学者和力民对台北“故宫博物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法国远东学院收藏的东巴经进行了编目。<sup>①</sup>

文献编目可了解东巴文献的总体收藏情况，方便学者查阅。但目前做得还不够全面，且信息过于简单；国外收藏经书的编目则更少，这方面的工作有待加强。

### （三）文献断代

东巴文献的断代可考察东巴文和东巴文献的产生及演变，是推动东巴文化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途径。东巴经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于世的，经书的末尾有时有抄写人的跋语，有的跋语有纪年，可以帮助确定经典抄写的年代。李霖灿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麽些经典》一文中撰写了“有年代经典之初步研究”部分，指出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东巴经中发现了“上起清康熙七年(1668年)，下迄‘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一批纪年经书。喻遂生对《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有纪年跋语的115册经书进行了研究，对部分纪年经典的绝对年代进行了推勘，并做了很

<sup>①</sup> 和力民、杨亦花等：《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东巴经书目简编》，载《长江文明》第三辑，2009年6月；和力民：《法国远东学院东巴经藏书目简编》，载《丽江文化》2010（3）。

多有益的探讨。<sup>①</sup>和继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藏东巴经跋语初考》<sup>②</sup>一文通过跋语考证了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部分东巴经的书写时间和写经者,填补了几个东巴生平资料的空白。和继全《李霖灿“当今最早的麽些经典版本”商榷——美国国会图书馆“康熙七年”东巴经成书时间考》<sup>③</sup>一文,通过对该经书跋语的重新释读和考证,确定了此经书的成书时间为咸丰元年(1851年)。

除根据纪年经书外,喻遂生《纳汉文化交流和纳西东巴字的历史层次》提出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考订一些东巴字产生的大致年代,并以此作为内证,来划分东巴字的历史层次和探寻其产生的时代。<sup>④</sup>《〈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纪年经典述要》提出可根据经书的内容、文字和字词关系来推断经书相对的早晚;通过经书中有时代标记的字词来确定此字词和有此字词的抄本产生的上限。但通过这些途径对东巴文献断代的成果还很少,今后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 三、字典辞书的编纂

1913年,法国人巴克的专著《麽些研究》在巴黎出版,此书比较完整地记述了纳西族和东巴经和东巴文。书中用法文、音

① 喻遂生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纪年经典述要》、《〈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的年号纪年经典》、《〈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的花甲纪年经典》、《〈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中的年龄纪年经典》4文皆收入《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第二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

② 和继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藏东巴经跋语初考》,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5)。

③ 和继全:《李霖灿“当今最早的麽些经典版本”商榷——美国国会图书馆“康熙七年”东巴经成书时间考》,载《中国民间文化论坛》,2010(2)。

④ 《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成都,巴蜀书社,2003。

标、东巴文、哥巴文列表对照的方式著录了 370 多个东巴字和约 400 个哥巴字。巴克被认为是第一个刊布并比较完整地记述东巴文的人，该书是当时东巴文化研究集大成的著作，对推动我国早期的东巴文化研究，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sup>①</sup>董作宾《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序》即称：“法人巴古氏（J.Bacot）于所著《麽些》一书（Les Mo-so）中，附有字典，以法文释义之字母为序。”虽然巴克之书并不是严格的字典，“为字不足三百七十，去详备尚远，又其记音释义之术，排列比次之方，可商讨者尤多”<sup>②</sup>，但筚路蓝缕，不可一笔抹杀。

国内学者编纂的第一部东巴文字典是纳西族学者杨仲鸿（1901—1983 年）作于 1933 年的《摩些文多巴字及哥巴字汉译字典》，喻遂生对此书稿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字典抄正稿、初稿、草稿及东巴经目录共 16 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字典分 18 类，共 1042 字。其基本体例是分东巴字、哥巴字和汉译三栏，用汉字注音（分直音和切音两种）、释义，有的还标明词性。尽管这部字典未能公开出版，而且收字较少，标音方式陈旧粗疏，但它毕竟是世上第一部严格意义的东巴文字典，其分类比较合理，释义也基本正确，在东巴文化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sup>③</sup>正如董作宾所说：“国人于麽些文字成一有系统之作，当首推杨氏，虽然他的字典采录编纂，未能美备，而他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sup>④</sup>

① 木仕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关于纳西文化研究的述评》，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1）。巴克书中部分东巴字列有异体，又有时东巴字和哥巴字错杂，故各家计数小有差异。

② 闻宥：《评〈麽些象形文字字典〉》，载《燕京学报》，1946（1）。

③ 参见喻遂生：《杨著〈摩些文多巴字及哥巴字汉译字典〉述略》、《杨著〈摩些文多巴字及哥巴字汉译字典〉述略补记》，见喻遂生：《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第二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

④ 董作宾：《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序》，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



1932年，北京大学刘半农鼓励方国瑜回丽江研习纳西文字，1935年，《麽些文字》稿成，章太炎为之作序，但未出版。1940年，第二次定稿，但被美国人罗伦士（Martis Rorius）以愿将此书译成英文作英汉合璧出版为由劫走。1964年，在傅于尧的协助下重新整理，改称《纳西象形文字简谱》，亦未出版。1979年，在和志武的协助下第四次定稿为《纳西象形文字谱》<sup>①</sup>，于1981年出版。收字共1340个，加异体字、附收字共2288字。对《纳西象形文字谱》学界评价极高。郭大烈认为有“编撰参订，珠联璧合。体例完善，内容丰富。释义简明，准确可靠。把握整体，探索文字。抓住本质，探索文字”<sup>②</sup>的特点；木仕华认为“《纳西象形文字谱》的发行，开创了纳西文字及纳西文化研究的新局面”<sup>③</sup>。华东师范大学王元鹿称此书为“一部纳西族的《说文解字》”<sup>④</sup>。《纳西象形文字谱》是使用率最高的一部字典，许多研究文章都以其所收东巴文为材料。喻遂生对其《常用词汇》部分做过一些订补<sup>⑤</sup>，近年来也有学者对《纳西象形文字谱》的字形结构分析、异体字、字义和翻译，以及其他问题指出了一些错误，并提出了一些质疑。<sup>⑥</sup>

1944年，李霖灿《麽些象形文字字典》在四川南溪李庄出版，该书由东巴和才读字、张琨记音，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东巴文字典。李济在序中称其“材料的新，观念的新，方法的新，解释的新，都值得表扬”。1953年，考古学家卫聚贤以“说文

① 方国瑜、和志武：《纳西象形文字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② 郭大烈：《评〈纳西象形文字谱〉》，载《思想战线》，1982（3）。

③ 木仕华：《纳西东巴象形文字辞典说略》，载《辞书研究》，1997（4）。

④ 王元鹿：《〈纳西象形文字谱〉评价》，载《辞书研究》，1987（4）。

⑤ 喻遂生：《〈纳西象形文字谱·常用词汇〉订补》，见《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成都，巴蜀书社，2003。

⑥ 黄思贤：《〈纳西象形文字谱〉质疑》，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5）。